



澳洲學者白杰明的「後漢學」主張及其
中國意象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inology” and
Geremie Barmé’s Studies of China**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蔡芷茵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石之瑜

Tsai, Chih-Yin

(Graduate of the master’s program,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Sun Yet-sen University)

Shih, Chih-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inology” and Geremie Barmé’s Studies of China

Tsai, Chih-Yin

(Graduate of the master’s program,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Sun Yet-sen University)

Shih, Chih-Y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eculiar and yet critical notion of “New Sinology” (or post-Sinology in Chinese) promoted by Australian Sinologist Geremie R. Barmé. Such an agenda benefits from Austral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mbedded in an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Post-Sinology studies anything related to the Sino-sphere and therefore refers to the constant reconstruction of people and sites that constitute China. Its critical potential lies in its determination to preserve open-endedness of the scope of China to transcend any territorial vicinity where the Han and closed-related groups are used to dominating.

Keywords: Geremie R. Barmé, New Sinology, Australian China studies, China studies, China

澳洲學者白杰明的「後漢學」主張及其 中國意象

蔡芷茵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石之瑜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本文考察澳洲學者白杰明近年所開展的中國研究，分析作為其所提倡「後漢學」研究對象的華語語系世界，其間傳承了中文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內人類學之傳統。白杰明以華語語系世界詮釋多民族與地方組成「中國」之概念。藉著對區域與當代中國研究的批判，多民族與地方的概念獲得擴充，「中國」不再僅是地緣上親近空間的集合或附屬漢族歷史的其他民族，而是跨越國家邊界與民族的開放社群。

關鍵詞：白杰明、後漢學、澳大利亞中國研究、中國研究、中國

壹、前言

中國研究長期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之研究範疇，近年來，由於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的成立，改變了澳洲國立大學既有的學術分工，顯示澳洲政府尋求其他角度理解中國之需求。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為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創辦時期第一任負責人，同時也是後漢學的倡議者與代表學者。因此，白杰明對中國所持之觀點，成為引導澳洲官方看法的一股知識流派。白杰明熱衷於「後漢學」議程的提倡，其間提供什麼樣的觀點，勾勒出何種中國圖像？本文考察澳洲學者白杰明近年所開展的中國研究，分析其論述內中國的形象與界定，而作為其所提倡「後漢學」研究對象的華語語系世界，則可視作這些中國意象之集合，或者是替代既有的「中國」概念為目的之詞彙。

中華全球研究中心成立後與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CICIR）合作，提出《中國和澳大利亞關於雙邊關係的聯合報告》，在承認雙方觀點與意見差異的基礎上，以「諍友」為原則，建立坦誠且持續之對話交流。諍友象徵人與人之間互動往來的規範，說真話是其基本原則，白杰明強調後漢學秉持該原則進行研究。然而，中華全球研究中心集結該中心對2009年至2012年中國社會現象之分析所出版的2012年中國故事年鑑（China Story Yearbook），受到中國外交部抗議，認為其內容有失公允，並禁止中國境內存取該線上期刊。白杰明認為其秉持正直開放之態度，從當代中國文化記錄中國之變遷；透過對現代性的反思認識當代中國之發展。本文介紹他的知識角度，提供讀者比較完整的個人系譜，或有助於未來進一步分析其觀點何以在中國大陸學界衍生爭議。

貳、白杰明的中國經歷

白杰明出生於澳洲雪梨，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第一任的負責人，同時擔任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出版之線上期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的共同編輯。白杰明的研究範疇主要為1949年後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文化歷史，除學術研究外，亦參與相關影片之拍攝，紀錄1949年共產黨統治中國後所發生的兩個重大事件：文化大革命與天安門事件。白杰明是在與西方中心觀點的辯駁過程中形塑其看法，其著述、評論大部分皆以英文書寫，並在2004年獲頒列文森現代中國研究獎（Joseph Levenson Prize for Modern China），體現他預設英語語系世界為主要對話對象，爭論與回應當代中國研究之前提與立場。

一、早期的中國經驗

1972年中澳建交，帶動兩國科技、文化、教育與醫療衛生等交流。白杰明於澳洲國立大學主修中文，在1974年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情況下，以交換學生之身分至上海復旦大學。此時中國仍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課程以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為主軸；校內經常發送批判林彪與孔子的刊物；同學間則以共產主義的觀點討論階級權力關係及批判資本主義。在文革期間，復旦大學正門掛有斗大標語，引述毛澤東所言：「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提醒每日往來的學生、民眾信奉共產黨階級鬥爭的路線。白杰明初到中國時，恰逢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佔領社會各角落。

除標語外，當時年輕的白杰明也親身感受到，社會控制也滲入每日生活中。中國媒體擔心外國人士若閱讀地方新聞，可能獲知國內機密，因而限制外國人士所能閱讀的刊物。即便能取得受到管制的刊物，可能也無法從文字標題，了解刊物內容所欲傳達的訊

息。以報紙為例，每日所有報紙頭版皆是加框粗體；如神諭般曖昧不清的毛主席最高指示。標題字體的大小、加粗或斜體、橫向或縱向，報紙的排版蘊涵著各種象徵與暗示。¹報紙上的照片亦是如此，不能僅限於眼睛所見，照片的刊登與拍攝都蘊含特殊意涵在其中，而其意涵是留予讀者自行想像。由此顯示當時中國的言論和大眾媒體受共產黨控制，當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所傳遞之訊息是被鎖碼、扭曲時，同時顯現社會的公眾生活與現實受到隱蔽。

白杰明在中國求學期間曾受到勞動改造，被送至遼東半島採收將出口到蘇聯的蘋果。²1977年白杰明離開瀋陽的勞改營至北京，在當地結識了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與藝術家，如楊憲益、丁玲、吳樹光等。滯留北京時，他曾申請南京大學，然而卻為當局所拒絕，認為其為無政府主義的資產分子。³文革時期大學的教材內容經常被任意刪改，課堂上熱烈討論的議題可能突然間因政治因素而被修改與噤聲，這與白杰明過往的求學背景產生衝突，促使他對革命產生幻滅與反思。⁴眼見無法繼續學業，白杰明到了香港擔任期刊的英文編輯，也為香港大公報撰寫文章，同時也和同事共同翻譯報刊文章。毛澤東去世後，中國開始去毛澤東化與為文革時期冤假錯案平反，中國文化圈暫時走出文革的陰霾。因地利之便，白杰明與中國及香港的知識份子往來互動頻繁。然而在魏京生被判反

-
1. Geremie R. Barmé,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2.
 2.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
 3. 白杰明於《In the Red》序言中指出，「無政府主義的資產分子」被認為是專注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的外國惡勢力之一，但並未提及他被如此對待的原因。但在涂成林（1999年，頁116）對他的訪談中，白杰明表示，當時他在遼寧大學中文系就讀時，經常代表同學向老師表示意見，故申請就讀南京大學時，因「平時喜歡講怪話」、「思想有問題」未通過審核。
 4. 涂成林，「穿針眼的樂趣—青年漢學家白杰明印象」，*開放時代*（廣州），第10期（1999年），頁114~117。

革命罪後，白杰明決定離開中國將研究領域轉向日本，但1980年至1983年，他仍持續為香港出版社撰寫諷刺和文化評論之文章，亦翻譯中國當代文學。透由中國經歷作為過往澳洲文化、社會形態與常民生活之對照，使白杰明對中國產生更多的認識與興趣。

二、後漢學（New Sinology）

早年接觸中國之經驗使白杰明對中國的認識不同於其他澳洲漢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民眾、學生以及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的號召下，無一不被捲入政治活動。對白杰明而言，這種社會生活的泛政治化是特殊且難以想像之經驗。若澳洲逐步脫離美國中心而將外交政策導向亞洲地區，中國勢必成為澳洲深化亞洲認識和研究的對象。此外，對外關係軸心之轉換以及中澳關係的變化，促使白杰明認為有必要重新詮釋中國。據此提出的研究思維——後漢學亦獲得澳洲政府的認同，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表示後漢學將會是中國研究依循的原則之一。

後漢學的英文字是 New Sinology，New Sinology譯為後漢學，是白杰明自己採取的譯法。關於後漢學作為一種研究取徑或中國觀，白杰明在相關文章中都有著墨，他認為後漢學的提法，肯定古典與現代中文及中國研究之學術基礎間的對話與交織，同時鼓勵多種研究取徑與學科訓練的多元串連，無論它們主要為經驗實證或更趨向理論驗證。⁵白杰明在相關文章中皆採取此立場，顯示後漢學的概念是希望自新的角度（即當代中國與澳洲位置）重新思考漢學研究，並繼承部分的研究傳統（表現在提倡學習中文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同時，也可以從他網站名稱所強調的heritage，可知

5. Geremie R. Barmé,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 14 (June 2008).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道若使用「新漢學」一詞的話，由於「新」的意象中主要象徵當代，影射對過去之取代或斷裂，相當程度將屏棄白杰明所希望保留的傳統，何況若導致新舊的二分的思考方式，亦非白杰明所樂見。而「後」在使用上向來有批判與重新思考的意涵。

後漢學是對澳洲過去的中國研究進行反思後所提出的研究思維，有別於過往出於經濟利益、戰略考量的中國研究。2012年中澳建交40周年，學者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於中華全球研究中心的演講上指出，1990年代末期中澳關係漸漸以經濟為導向，除澳洲政府之戰略決策影響外，部分澳洲選民將利益作為衡量澳洲政治關係的準則，此種文化與態度又受到政黨之鼓動。⁶當人們習以關注個人經濟生活的改善而非能夠推動社會變化和改革之建設時，他們會以同樣的標準、方式衡量澳洲的對外關係。而他認為突破以利益為前提的中澳關係需要延伸想像力，「必須試想一個全然不同的關係，一個與今不同的中國觀察視角」。白杰明則是指出，人們需要對自我是以什麼身分在行動，有新的思考，「文化交疊」的思維就是試圖讓人們意識到他們不僅受單一文化的影響，「各種文化在世界擴散影響著人們，使得每個人事實上都受到複數文化的影響」。⁷自交疊的概念出發，研究中國便不僅是出於經濟利益，亦是重新衡量當前民族、國家與世界間的共通性。而此種身分思考所開展的華人意涵，是把每個個別華人視為非特定地區、國籍或血緣的中國文化參與者。另一方面，基於世界文化的共通性與不同文化

6. Stephen FitzGerald, "A Chinese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The China Story*, December 28, 2012.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2012/12/a-chinese-stretch-of-the-imagination-%E8%88%92%E5%B1%95%E7%9A%84%E6%83%B3%E8%B1%A1%E5%8A%9B-%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4%B8%8E%E4%B8%AD%E5%9B%BD%E5%B7%B2%E5%B1%8A%E5%9B%9B%E5%8D%81/>>

7. 轉引自曾彥中，「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與何包鋼的學思歷程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75。

相互交織的情況下，中國因現代化產生之現象可能是人類普遍面臨的困境，而能夠作為其他國家、文化之借鏡；反之，其他國家與文化亦然。

自1950年代澳洲的外交策略由英國轉為美國中心，並藉由增進與亞洲國家之關係防堵共產主義擴散後，澳洲政府開始鼓勵澳洲人民學習亞洲語言。學習中文除有益於中澳兩國經濟貿易的便利外，中文亦是理解中國的關鍵。後漢學主張「中國」能夠藉由語言產生更大的範圍與意涵，人們使用中文溝通、閱讀與敘述並經由不同語言、社會文化背景的使用者輸出其他的意義，白杰明稱藉此形成的集合為華語語系世界（Sinophone world）。透過後漢學重新詮釋產生之中國概念，究其意涵，後漢學的研究議程對過去中國研究與對象採取了反思，將所分析的對象視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從行動者的身分展開思考，因而拓展了中國作為研究課題之範疇與內涵。

參、當代中國文化研究

白杰明擺脫既有漢學範式所嘗試建立的，是在文學研究脈絡下的多源頭的華語語系，蘊含著去中心與後殖民的隱喻，期望以此名稱概括過去中國以外、邊緣之群體和事物。亦是一種對當代與全球化情境下，中國概念的調整與邊界重劃。然而，後漢學對其之使用則是源於相異的脈絡，自白杰明所援引之文獻，說明他使用華語語系是包含著擴張及置換當前中國研究框架的期待。若將「後」漢學視作白杰明所處之澳洲中國研究發展位置的標示，此種期待反映了澳洲中國研究的基礎，即發展於美國區域研究框架的個別國家（中國）研究。

從白杰明的分析內容中，明確可見他對討論中國現代化觀點

的批判。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的議題受到廣泛之討論，其源起及性質亦受到諸多關注，其中，現代化進程中市民社會、市場經濟與民主化的關聯更是被反覆檢視的問題。在《In the Red》中，⁸白杰明的分析框架依然顯現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取徑的特色，亦即把共產主義當作研究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變項。參考前蘇聯國家共產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國展現了現代化的特徵卻表現出不同於西方國家的社會形態。另一方面，白杰明在《In the Red》中透過共產主義與非共產體制間的現代化進程比較，反駁了現代化理論所勾勒的社會單向集聚之假設；同時，其論證也為後漢學的研究取徑預留伏筆。自1980年代以來，不論是制定相關政策或聲明澳洲與歐美國家利益的殊異，澳洲政府與學界都期望能夠參與亞洲。這樣的行動涉及實踐與論述的改變，而白杰明的中國觀與後漢學研究取徑皆可當作澳洲脫離西方中心世界圖像、探尋新身分的根本性改變。不僅是意識到中國對澳洲的影響不同於歐美國家；或認知到中國文化、社會環境的變化，後漢學試圖達成的是對中國認識的改變。在此過程中，白杰明藉由與當代中國研究之前提、假定對話，形塑其見解。就此而言，若文學研究透過華語語系之概念揭露「中國」的殖民現象，以及賦予行動者自主性；則後漢學主張華語語系的中國觀亦是期望澳洲脫離歐美中心的世界圖像。

由於改革開放政策，1980年代興起以西方的現代化進程評估、衡量中國社會之論述。這套論述認為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裡，在經濟秩序與政治秩序之間存在著一種路徑依賴關係，舉例而言，西方現代的社會在市場經濟、中產階級為主的階級結構及民主政治的支配形式間展現一種親近關係。它們提供了一種現代社會發展的典範，甚至可被解讀為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作為判斷國家發

8. 參見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展之依據。因而，當中國大陸施行經濟開放時，自然被預期將依循此種路徑發展。白杰明的「當代」中國文化研究則是為了釐清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過程而進行的：經濟發展是否將促使中國大陸依循西方的現代社會發展經驗。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中共的支配形式自粗野、軍事化的史達林式統治方式轉變為軟性的市民政府，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變遷似乎和其他國家過去的轉型經驗相似，中國政府不再是某種例外。准此，白杰明乃提出比較：「在西方、台灣與日本的出版業同樣會控制作家；澳大利亞的文學與藝術授權之獲利是由制度所分配。然而簡化（文化管理的）比較，曾被如哈瓦茲梯這類作家所批判，認為不應省略分析晚期社會主義（late-socialist）文化的重要性」。⁹

但在相同、普遍的表象下，白杰明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依然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主要之差異。在《In the Red》中，他更通過比較分析的方法，針對共產主義與非共產體制之對比，比較不同文化類型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而其用來形容當代中國文化環境的絲絨監獄（velvet prison）一詞，凸顯了中國大陸社會秩序的特殊性，也就是極權制度及其價值與權力關係仍影響著當代中國，使中國大陸在現代化的過程發展出另一種路徑及形態。

一、不同政治文化下的現代社會發展進程

白杰明¹⁰批判的觀察指出，自1980年代起中共便放棄馬列思想為社會發展指導方針，轉而擁抱布爾喬亞的市場經濟。經濟秩序的變化讓人們在市場內獲得前所未有表達自身與選擇不同生活風格的權力，這種權力被延伸當作一種對中共官方灌輸之民族國家認同的

9.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13.

10.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51.

抵抗。中共因開放市場競爭而無法持續壟斷中國的知識與文化生產，舊有的政治符號也因商品化而失去原先的象徵意義。

出版業的興盛是造成中國知識與文化的多樣性的因素之一。出版商知道爭議與敏感性是最暢銷的題材，人們在被強迫接受單一觀點的歷史後，產生了對獵奇與虛構觀點的渴求，因而促使許多作者去挖掘1949年以前的歷史。¹¹

…在深層意識結構裡，毛澤東已經成了一種象徵物或乾脆就是消費的符號，他們用他進行買賣。¹²

透過書籍、漫畫、電影電視和音樂，舊世代的革命領導如毛澤東與他為人所知的幹部們，成為大眾流行文化視聽節目的一部分。¹³

上述符號的轉化與挪用，或多元化的歷史觀點與詮釋，曾經出現在其他國家或用於描述資本主義流行文化的敘事，也能夠用於述說當代的中國文化與現象。市場經濟、大眾文化與民主運動等現象，讓中國站上世界的舞台，展示中國與其他國家是如此的相似，當代中國所發生的事件就是其他國家過去的翻版。¹⁴

白杰明對他所觀察到的上述現象指出，採取此種敘事的中國故事是將一套既粗淺又具有普遍性的論述，套用到中國複雜且自相矛盾的現象上。藉著把自由市場、消費社會與中產階級興起，當作現代化的指標，中國被編排為非共產體制國家能夠理解或預期之對象，亦即可以透過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經驗解釋中國之行動。對白杰明而言，這樣的應用等同假設中國社會的發展處於西方現代社會

11.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266.

12.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49.

13. Geremie R. Barmé,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 42.

14. Geremie R. Barmé, "History for the Masses,"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p. 44.

的發展初期，從而亦使80年代許多的知識份子將「走向世界」視作中國的發展方向。他的看法介入了兩位當代論者的觀點對比之間，因為他們處理的恰恰是，1989年前蘇聯解體後，共產主義國家對經濟與政治的改革受到諸多的關注，成為檢驗西方經驗能否作為單一、普世的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之對象。

首先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將意識形態與國家經濟形式的矛盾視為現代化以及政治體制從左到右的進程之一，而前蘇聯國家從共產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的階段被其稱為後共產主義。他認為，後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於20世紀發展產生的矛盾現象，此矛盾能否被克服取決於共產國家是否能夠朝企業自由經營的方向發展；是否能夠放棄對社會生活的直接控制。¹⁵相較於布里辛斯基認為後共產主義即是共產主義者更換另一種理論及實踐繼續統治國家的現象，霍美士（Leslie Holmes）則是指出，後共產主義揭示對某些事物的否定和棄卻，但並不表示它完全接納與之對立的事物¹⁶。布氏提出解決共產主義矛盾的方式，顯示自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對共產主義之批判，即若共產主義包含計畫經濟、國家所有制的經濟形式，則實際需要的就是市場化、私有化的經濟形式；若共產主義的實踐代表一個全能型的政府，則實際需要的就是一個少干預的政府。亦即前共產主義國家的人們設想以什麼概念替代共產主義時，並不是一個主動推論而是被動演繹的過程。霍美士因此認為，雖然共產主義失去人們的信任，但民主與市場等概念並未像在西方一般深植人心，共產主義持續影響著人們對特定概念的看法。這也就是說，後共產主義國家依舊深受共產主義的政治遺產與文化影

15.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p. 252.

16. Leslie Holmes, *Post-Commu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 14.

響。

霍美士從政治文化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後共產主義不僅是統治者或政府對特定事物的否定，新的社會秩序同時需要深受共產主義制度影響的人們之實踐而生成。哈維爾（Václav Havel）也採取類似的立場，他在分析共產主義的轉變及矛盾現象時，並未侷限於統治者的作為或共產黨之政策，而是指出後極權（post-totalitarian）制度是建立於人們的妥協、確認甚至為之添磚加瓦。¹⁷西方的現代化經驗顯示經濟發展與支配形式存在著路徑依賴關係，經濟發展促成價值多元化、中產階級興起以及市民社會的出現，新興團體的需求提供了民主化的壓力與基礎。霍美士與哈維爾則從政治文化及社會秩序的角度，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並無必然的連結，共產主義體制內的人們對市場、政黨以至於民主的詮釋和實踐皆迥異於其他國家。「後極權主義體制是建立在獨裁政權與消費社會的這個歷史性的遭遇之基礎上」。¹⁸由此觀之，經濟秩序與支配形式之連結僅限於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經驗，經濟發展能夠促使人們要求民主化；亦可以促進人民對極權政府的支持。他們從社會文化展開的觀察，成為白杰明比較非共產體制與共產主義文化的途徑，對比西方的現代化指標與當代中國現象之差異。

在試圖討論這些文化情勢之轉變時，我經常求助於一群小卻著名的「自由知識份子」的中國作家團體；那些由東歐國家及蘇聯之作家和學者，提供對衰敗社會主義之矛盾的嶄新與批判視角…；以及南非和南斯拉夫的小說家，這些著作皆能於此找到位置—我們討論的不僅是改革開放之中國特有的議題，…。¹⁹

17. Vá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Jan Vladislav ed.,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 41.

18. Václav Havel著，崔衛平等譯，**無權力者的權力**（台北：左岸文化，2003年），頁91。

19.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18.

1989年之後，經濟發展結合自由主義的論述，提供消費作為反抗共產黨文化、意識形態與生活模式之手段。在此情況下，台灣政治轉型的軌跡成為大陸現代化階段目標之參考，「投票式民主或許必須延遲至廣大的中產階級為基礎，但消費共和國卻能夠立即實現」。²⁰但白杰明認為共產主義的制度與文化影響著中國大陸對市場的詮釋與實踐，進而脫離了西方現代化的軌跡。

中共官方文件有著許多關於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文化市場，以及提供大眾消費文化產品正確指導的爭論。於此修辭之下才是經濟改革的事實。²¹

在經濟市場中，共產黨經歷了意識形態價值的貶值，但未必導致符碼的通膨或破產。主要由於中共支配的本質以及官方實際仍嚴格控制大眾媒體，另外共產黨能夠獨立於廣告文化對語言、象徵等符碼系統的大規模洗劫。²²

白杰明藉由西方現代社會的發展經驗比較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社會，從現代化理論所指出經濟發展與民主體制之選擇性路徑關係，分析當中國大陸的經濟秩序朝向現代化時，共產主義社會特有的制度與文化如何阻礙了其支配形式的轉型，因此文化的延續與變遷比制度或價值的轉型，是更貼切的問題意識。

二、消費社會與共產文化

在此，白杰明並不是為了彰顯西方文化而研究中國大陸的發展歷程；相反的，他認為共產主義國家以經濟秩序為改革開端的發展過程，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模式之一，對比兩者間的差異凸顯了中國大陸社會、文化之獨特性。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過程裡，白

20. Geremie R. Barmé,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0), p. 51.

21.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17.

22.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252.

杰明雖然注意到有共產主義文化與商業機制兩種作用力，但他特別強調前者的重要性，後者往往直接或間接地鞏固既有的社會秩序。舉例而言，1970年代中國大陸興起之傳記文學、紀念日與博物館等商品化記憶的文化工業，促使部分在文革時期被批鬥的文化、學術與政治人物，藉由大眾對某個時期與時代的關注而獲得平反與發聲。但白杰明認為這些商品的生產製造實際上是由該時期共產黨的宣傳與出版內容所決定，商業利用結合政治權力創造出一個相關產業快速成長的理想環境。²³

1980年代中國大陸出版業的蓬勃發展，顯示人們有機會也試圖獲取各種言論和觀點，但市場追求利益的特性恰好可以避免某些高風險、涉及共產黨統治合法性之議題的出現。白杰明認為市場內的理性行動者，實際上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消費者，無法改變中共對社會價值或歷史詮釋的壟斷。1980年代許多歷史學者揭露並公開關於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等中共黨史的研究分析，但小說家、記者、電視與商業出版社採用非嚴謹的學術方法，甚至是具有煽動性的題目，反而對大眾的歷史觀產生更深刻影響。²⁴在市場的運作下，消費者的需求促使創作者提供能夠吸引大眾討論之議題與題材，放棄重新開啟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辯論或尋找新的角度詮釋歷史。因而，經濟秩序的現代化無法自動促成價值觀點的多樣化，或者說凝聚能夠抗衡國家力量的市民社會。他指出：

中國經濟的轉變或許可以預期市民社會的大幅成長；但在此環境中個人可能更多地被建構為自我中心的消費者，而非具有自主權的公民。²⁵

由此可看到他藉西方經驗所形成經濟發展與市民社會成長呈正相關的假定，對比不同文化（西方與中國）之間的現代化路徑，

23. Geremie R. Barmé,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pp. 348-349.

24. Geremie R. Barmé, "History for the Masses," p. 266.

25.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236.

探尋中國大陸社會環境的獨特性。

對白杰明而言，由於共產主義體制內的統治者與人民間存在著特殊的文化或關係，讓中共對社會價值與歷史詮釋的壟斷成為可能。他參考東歐知識份子的觀點稱這種行使隱蔽暴力、自我審查的共產主義社會為絲絨監獄，在此環境中統治者與人民之關係並非僅是單方面的鎮壓或脅迫，而是藉著知識份子、讀者觀眾和政治幹部等社會集體之參與，以共識取代脅迫，批判性地創造出新的社會契約。白杰明寫道：

對1949年前後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件與決策的詮釋，經常觸及今日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即使個人利益未涉入對這段歷史的詮釋，但當中挾帶著對過去同僚、朋友和上司的忠誠，這些隱藏的關係網絡阻礙了重新坦誠與完整的解讀歷史。²⁶

中國大陸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相同，人們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體制的建構與鞏固，故難以坦誠與完整地公開過去的事件。另一方面，在共產黨治理下，頻繁的政治活動、需要特殊解讀方式的標語及談話等，形塑了當代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形式與知識份子之寫作風格。

這些畢業自毛澤東思想大學的知識份子對古為今用或借古諷今的手段再熟悉不過。當許多完成或正要完成的作品，採取哈瓦茲梯稱為培育言外之意文化的策略時，這種做法會混淆一些對中國文化情況的基本議題，實際上則是將注意力轉移至分析更有吸引力且風險較低的文化議題。²⁷

值此，可以明確地看到白杰明認為公共議題在中國社會依據對共產黨統治的影響有著風險高低之分別，人們對各項議題的風險

26. Geremie R. Barmé, "History for the Masses," p. 285.

27.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5.

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並且避免討論具有高風險的議題。事實上，訴求言外之意的策略就是人們在言論中不斷自我審查的結果，試圖從「顛倒正統的過程中又確立出另一個模式，並且是向著未來的政治秩序投資」。雖然經濟改革使人們在市場內獲得表達自身與選擇不同生活風格的權力，但共產黨透過培植官方藝術、媒體與刊物，依舊維持著對社會價值的掌控，控制什麼議題能夠被討論，或決定何種生活模式與價值是正確的。當既有的權力結構維持不變時，中共就可以挪用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符號及連結，發展官方意識形態與維持統治地位。代替共產黨中央指導大眾正確價值和生活模式的《北京青年報》編輯曾表示，人們有根據自身偏好的生活模式實現理想的自由，但至少他們應該要認同官方提出之生活模式的正確性。這樣的認同是「積極的第一步」。²⁸白杰明認為，即便這些編輯拒絕承認，但讀者的反饋呈現1990年代初期學生對自身與社會的看法，受到經濟改革與學術開放的影響。代替共產黨中央指導大眾正確價值和生活模式的《北京青年報》編輯曾表示，

人們有根據自身偏好的生活模式實現理想的自由，但至少他們應該要認同官方提出之生活模式的正確性。這樣的認同是積極的第一步。²⁹

自上述引言，顯示中共官方認為觀點與價值的多樣化不應取

28. 轉引自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112.

29. 轉引自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112. 1991年4月北京青年報以「兩個著名的路線：焦裕祿與三毛，你會如何選擇？」為標題，請讀者（中學生）發表己見。青年報總結讀者來函發現：學生與讀者較偏好焦裕祿。然而，他們對焦裕祿的偏好，不表示選擇其為模仿學習之對象。部分學生表示，教育讓他們欣賞、支持焦裕祿的行為，但現實生活迫使他们做出其他選擇。相較於譴責讀者思想的錯誤，青年報的編輯更傾向將討論導引至他們所期望的結論，即展現一個選擇的可能性與告訴讀者：有一個更崇高的生活模式與理想。白杰明認為，即便這些編輯拒絕承認，但讀者的反饋呈現1990年代初期學生對自身與社會的看法，受到經濟改革與學術開放的影響。

代社會單一的價值觀，白杰明亦自此確認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在中國大陸展現為兩個完全獨立的目標，兩者的進步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無論未來經濟與政治秩序如何發展，共產黨所塑造的價值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基礎的文化態度與意識。相對於西方，在中國大陸，在極權主義制度及共產主義文化的影響下，原本能夠衍生多元價值、觀點與凝聚市民社會的市場經濟，因人們以既有的知識和行為模式適應當前經濟及政治秩序的轉變，而摧毀了西方發展經驗所確立的現代社會發展模式。

三、後共產主義的中國

白杰明想要說明的是，從文化間的比較來看，相對於西方（非共產主義體制）社會的發展模式，中國大陸這類型的現代化進程，亦即市場經濟與極權制度共存的社會環境是共產主義社會所獨有的。在此認知與分類下，白杰明認為共產黨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力是大於其他各領域的作用力，他們可以藉著對符碼、媒體和制度的壟斷維持其統治。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失去其價值與主流地位時，中共透由國族符號與神話支持其地位，強調自身作為民族愛國的重要力量。³⁰受到共產文化將任何批評皆視作不友好或是不了解國情的影響，當代中國大陸形成排外、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從而中國大陸可以既主張現代化又譴責美國（非共產主義）文化的腐敗。由此觀之，白杰明的中國研究是傾向也具備美國之當代中國研究的特色，將共產主義當作研究中國社會現代發展的重要變項。

他將共產主義作為中國研究的背景並非期望建構一個對立於西方的現代社會發展類型，而是因新的政治、社會秩序需要透由受其制度及文化影響的人們實踐而形成。在這種問題意識與認識興趣

30.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256.

下，白杰明分析的重點在於當代中國的人們所處之環境條件；對社會秩序產生了什麼作用，以及既有的社會文化條件產生何種制約等。³¹經由與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經驗的對比，共產主義與非共產體制的分類成為顯現中國大陸社會環境獨特性的方式之一，並進一步顯示中國大陸既有的文化如何制約其社會秩序趨向西方社會的形態。白杰明對「當代」與「傳統」的區分並未採取「西方影響／中國回應」之立場，將中國的時間依接觸西方與否區分為傳統和現代，而是把共產革命視作當代中國社會秩序與環境的分界。雖然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藉著共產黨的宣傳與塑造而形成，但中國傳統文化依然限制著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行為受到功利主義和儒家思想遺產的驅使，將管理民族國家視為個人的最高成就。³²此種文化與傳統讓中國與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秩序產生差異，因為「比起東歐知識份子，中國知識份子對極權的日常統治更為順從」，³³他們更為重視與國家間的合作關係。相對於俄羅斯人把回到祖國視為流亡者的勝利，中國知識份子等待的則是政府的招安。³⁴

就此而言，白杰明與霍美士一樣都認為，中國社會存在著對極權統治形式之嚮往。在人們對市場開放與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感到不安及焦慮的情況下，他們自發地形成懷念毛澤東

31. 白杰明對80年代中國大陸的流氓文學便採取此種分析方法。它顛覆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的價值觀，卻也為之吸引了曾被共產主義所吸收的社會底層階級。部分學者認為1980年代中國的流氓就如同1960年代歐美國家的嬉皮，都同樣處於社會邊緣並試圖反抗社會的核心價值。對白杰明而言，這樣的類比和分析簡化了中國與歐美國家相異的社會脈絡，他認為流氓是生成於中國文化的名詞與概念，它在當代中國的使用實際上展現了後文革時期大眾的精神狀態：「他們親身目睹了文革的一切，…因此打從開始便無法非常自覺地接受文革中的說教」（Barmé, 1993, p. 49）。在工業化、經濟結構轉變的情況下，流氓文化結合了北京的哥們文化與中國之傳統俠客形象；再現了北京青少年文化與80年代中國都市生活中，疏離的精神與半邊緣之人際關係。

32.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p. 49~50.

33.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6.

34.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59.

之現象。因毛澤東肖像的流行而產生對同時代的懷舊現象，並非官方有意創造而是民間偶然形成之潮流。³⁵雖然鄧小平所實踐之改革開放承諾更好的經濟發展，卻讓中國失去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國獨立於西方的民族榮譽感與自我價值；相較之下，毛澤東因讓中國躋身於美、蘇強權之間而獲得更多的尊敬。³⁶對白杰明而言，共產主義的社會秩序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於當代中國產生之作用，反駁了因中國工業化、開放市場等變化所衍生的社會形態單向發展之預測。而此推論是來自於比較分析過程中，他認為中國社會內部之因素的重要性是大於經濟開放理論上所能夠帶來的行動模式。

白杰明強調中國社會脈絡的特殊性，是與澳洲的中國研究傳承息息相關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與亞太研究所科班訓練出來的白杰明，處於全球化及中澳建交後重新認識、定義中國研究之對象的過程中，透過參與觀察、田野調查，澳洲的第二代中國研究者意識到需要重新詮釋「中國」與「中國文化」所指涉之範圍，東方學研究中國經典著作、歷史和語言的傳統，因中國社會環境的改變與傳統文化之分殊，而難以詮釋中國的現象與行動。先後旅居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經驗，讓白杰明認識到即便兩者在地緣與血緣上具有親近性，卻因社會秩序的差異而有極為不同之書寫內容、風格與文化發展。在此狀況下，他以中文作為中國人之間的共通性，將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與海外華人等使用中文的社群，視作中文文化（Chinese-language culture）的範疇，目的在於涵括全球化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發展與關連。而以中文為框架獲致的中國圖像，亦體現了澳洲意識到自身利益與歐美國家的差異後，脫離英語語系世界（西方）以地理位置、民族為界線之世界觀的企圖。

35. Geremie R. Barmé,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p. 5.

36.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p. 258.

肆、後漢學所開放的中國邊界

1979年《澳洲中國事務期刊》的創刊序言就已表明，中國之於澳洲有著與歐美國家不同的利益，成為1980年代澳洲政府「參與亞洲」政策的先聲。加上1972年中澳建交與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研究的取徑與傳統，研究者如今可以進入中國進行參與觀察、田野調查且收集非官方資料；經濟改革也讓中國大陸重回開發國家之列，能夠為其他國家所認識與預測。雖然澳洲中國研究的建制與太平洋戰爭、冷戰密切關連，但澳洲的中國研究存在著結合人類學與田野調查方法的研究取向，受到此知識傳承的影響，相較於強調國家戰略及利益的區域研究學科，人類學始終在中國研究位居一個顯著的角色。同時在此種田野人類學視野之下，對於許多澳洲的中國研究者來說，中國似乎並非僅意味著一個政治單元的組合，反而更像一個多民族與地方構成的對象。對外關係、學科特性與發展之差異，促使澳洲的中國研究探尋脫離西方中心世界觀的可能。

白杰明將這種可能建立於新的共通性，即東方學、區域研究是基於民族、空間為框架所獲致的世界圖像，但人類的共通性並非來自地緣的親近程度，也難以被納入上述邊界之中。空間與民族形成的中國圖像先後被移民、民族認同所挑戰，同時顯示以此界定的「中國」是某種客觀認定之概念，代表著某種中心或角度的觀點，即「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然而，白杰明認為除了客觀認定的標準外，對「中國」的界定也應考量人們主觀之實踐及參與。在此情況下，中國研究被他描述為「對當代中國堅定的參與行動，且事實上包含在地、區域與全球華語語系世界（Sinophone world）的參

與」。³⁷白杰明進一步表示，更傾向稱其所指稱之「中國」為華語語系世界，「一個由使用各種源自中國語言與方言的個人與社群組成」，並藉著說、讀、寫或參與各種不同的電子媒體等行動，賦予中國以及這些語言意義。

在2005年與2008年，白杰明所發表之文章皆於文中註腳提及黃樂嫣（Gloria Davies）對後漢學概念的貢獻。黃樂嫣為澳洲莫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文學研究所教授以及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範疇為當代中國思想、比較文學與批判理論，重要著作為：《Worrying About China: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2007年）透過論述分析研究當代中國思想。黃樂嫣與白杰明合著〈Have we been noticed yet? Intellectual contestation and the Chinese web〉中，援引布爾迪厄（P. Bourdieu）等人之理論，分析中國知識份子於網路空間的話語實踐。換言之，黃樂嫣的研究專長顯現，在中國歷史與文化層面之研究外，又為後漢學概念增加語言的向度。

這表明，華語被白杰明當作構成中國的共通性，於此基礎上放棄了地緣、血緣所刻劃的中國圖像，使之轉變為依據個人與社群實踐而存在或消亡的概念。而重新界定中國的需求並非僅澳洲有之，人口流動、全球時間與空間的壓縮促進了後殖民、族裔與歷史研究等新知識和詮釋的生成，同時也增加了重新區隔、劃分世界圖像之需要。本節從「華語語系」一詞於文學研究之意涵，釐清其所象徵與涵括的中國範疇，並比較該詞彙於白杰明論述之脈絡以及指代的意涵。

37. Geremie R. Barmé, "New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ewsletter Issue*, No. 31 (May 2005). <http://ciw.anu.edu.au/new_sinology/index.php>

一、文學研究脈絡下的華語語系

2001年以來，部分歐美學者參照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之概念，提出華語語系（Sinophone）等相關詞彙指代中國以及海外的中文社群及其文學生產。2001年華裔美國學者張錯發表〈文學獎的爭議與執行：世界華文文學領域探討與展望〉一文，提議重新劃分原先依政治實體區分的華文文學研究區域。他認為，華文文學區域應界定為以華語作為母語的各區域，取代以國界進行之劃分，從而各華文文學區域在同一語言下，衍生為一樹多枝的多元體系，平行發展卻又相互交織。³⁸由華文文學區域形成之多元體系或同一語系下產生的想像共同體的假定，事實上潛藏著對抗性之意圖，即減輕或脫離全球性西方語言與文化霸權對華文文學的影響力和價值判斷。2004年，張錯以華語圈（Sinophone）一詞概括其所指出關於華文文學的定義與區域劃分，其意涵等同於王德威與史書美提出之華語語系文學概念。

王德威指出，當Sinophone Literature被譯為華文文學時，該詞彙因人們長期的慣習將之視為廣義的中文書寫作品的總稱，亦即指涉中國大陸與以其為中心向外擴散之域外文學。在此意象下，創造出海外、港台、星馬與離散華文文學等詞彙，展現中央與邊緣對比之隱喻。然而，Sinophone Literature於英語語境下另有其脈絡，參照Anglophone（英語語系）、Francophone（法語語系）與Hispanophone（西語語系）等文學，意謂各語言宗主國以外，世界各地區以宗主國創作之文學，即19世紀以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擴張所形成的語言霸權與後果。雖然殖民母國自殖民地撤退，但宗主國語言的影響已經根深柢固，造成在地作家的失語；另一方面，異

38. 張錯，「文學獎的爭議與執行—世界華文文學領域探討與展望」，*文訊*（台北），第222期（2004年4月），頁7。

地、異化的母語書寫也形成對殖民母國文學的嘲仿與顛覆。³⁹王德威認為此殖民關係於華語語系文學呈現不同之面向；史書美則是延續其他語系研究關於殖民與後殖民的隱喻，反對在離散為前提下研究移居海外之華人群體。「離散中國人」被解釋為中華民族以世界為範圍之移動，「作為一個普遍化的範疇，它以一個統一的民族、文化、語言、發源地或祖國為基礎」。亦即「離散中國人」所隱含的共同體想像實際上顯現了對「中國」的簡化，中國內部的諸多少數民族在中國大陸境外便被化約為單一的漢族，文化以及語言亦然。在全球中華民族具有共同發源地的預設下，離散代表著對故鄉和祖國的忠誠與嚮往，離散者與祖國間形成必然之連結。然而，對「中國」的強調與傾注既不能解釋華語語系社群在全球的散佈範圍；也不能說明某個國家內族群劃分與文化身分異質性之增加。

藉著揭示離散、海外等概念的隱喻，史書美主張放棄中國性、中國人等本質主義的研究取徑，重新審視這些本質所挾帶之預設。認為中國具有某種特定本質的假定，掩蓋了過去與今日中國征服西藏、新疆和蒙古等其他漢族以外之民族的歷史，以及將標準漢語和書面漢語推廣至其他民族，所形成一種類似殖民的關係。當人們聲稱其他華語或方言不是中文時，就等於認同了語言與國籍之對應關係，並將此關係擴及至民族，造成漢族中心或漢族主導的同質化建構。另一方面，離散中國人與海外華人研究實際上是自當地社群或居留地政府的角度出發，將移民、外來者貼上他族的標籤，而中國性更是這些移民海外者無法融入當地社群之象徵。對史書美而言，「離散有其終時，因而堅信文化和政治實踐總是在地的，所有

39.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華文作家在哈佛大學」，聯合報，2006年7月8-9日，第E7版。

人都理應被給予成為當地人的機會」。⁴⁰

橫跨數個世代的定居，許多人會在第二代或第三代就結束離散之狀態，開始在地化，如此何以能夠繼續藉離散形容居留地的華裔移民。在此情況下，華語語系社群便是一個持續變化的群體，當移民的後代不再使用他們祖先的語言時，他們就不再是華語語系社群的一部分。換言之，它是一個開放的群體，其組成並非根據成員的種族或國籍，而是依據使用之語言進行界定。但用於界定之語言不僅指標準漢語，還包括地方和少數民族的方言，甚至融合漢語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或將地方方言口語化……，許多不同的語言共同構成華語語系。此種分類群體之方式相當程度將語言的使用視為一種有意識的行動，部分華文作家在充滿敵意的居留地藉由華文書寫，抗拒被居留國吸收；同時，他們卻採用混雜當地生活經驗、方言的獨特華文，超越唯中國中心論。「在此書寫並非追求永恆的抽象文學，而是發生在特定歷史情境的一個行動」。⁴¹

即便華語語系文學展現對中國強烈之鄉愁，其生成也是來自異鄉的生活經驗，也就是說華語語系文學是「落實於某時某地的文學」，此概念與黃秀玲認為華美作家展現「投入居留地」的看法，以及薩伊德（Edward Said）的「入世」論（secular criticism）相呼應。因而，華語語系並非是重新定義「華文」，使之再次作為國家或民族分類的特徵，更應將其視為「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一種理論或許甚至是一種認識論」。而這種新的世界觀、理論或認識論，開啟了原先華文文學的混雜、多樣與地方性，以及藉後殖民、族裔、跨國與區域研究分析華語語系文學的可能。

40.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編，*百川匯海：文史譯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2。

41. 史書美，「華語語系的概念」，*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馬來西亞），第14期（2011年），頁52。

二、後漢學脈絡下的華語語系

2000年，在〈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一文中，白杰明注意到中國大陸與國際已有部分文章，使用華語語系（Sinophone）作為一種特定知識的類別。他認為此種知識的增長與網路文化密切相關，預示著中文世界（Chinese world）的文化甚至政治可能性的轉變。於此，「中文世界」與《In the Red》內提出的「中文文化社群」所指涉的範圍相同，皆意指以中文溝通與交流的群體。此種藉由中文作為社群共通性，而非以地緣或血緣區別群體身分的方式，隨網路技術的發展而逐漸成為人們可以接受和想像的共同體。1980年代起網路雜誌的編輯、作家以及一些獨立、批判時事的知識份子，開始利用網路空間討論中國知識實踐之問題與議題，他們認為公眾的討論可以終結中共官方媒體與民粹主義論述造成之資訊不對稱和偏見。由於網路空間作為一開放社群的特性，藉此建立虛擬之公民社會將能避免成員身分受到社會政治與歷史界線的束縛，此特性同樣適用於網站編輯與管理者，使之跨越地理位置與語言的限制。⁴²

黃樂嫣同樣注意到網路傳播、參與的潛力，以及此技術對中國界線之改變。中國知識份子為獲得參加中國大陸改革進程相關議題之國際與地方性討論的機會，自1980年代起開始積極地學習和吸收西方知識理論；全球的讀者則可以經由中文網站或相關轉載，了解、回應中國知識份子間的論爭，從而中國知識「界」此一概念已超出中國境內發生的活動和事件。⁴³網路技術更明確地體現一種可以跨越地理、社會政治與歷史界線的身分類別；一種過去需要透過

42. Geremie R. Barmé,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p. 66.

43. Gloria Davies著，吳冠軍譯，「中國知識界：共同體追求中的分歧」，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73~274。

進出不同國界之經驗才能產生的共同體想像。

白杰明與黃樂嫣合著之〈Have We Been Noticed Yet?〉，延續兩人對網路作為虛擬公共空間的討論，並將「長江《讀書》獎」論爭⁴⁴當作分析個案。透過文本分析，白杰明與黃樂嫣認為西方理論在中國被轉譯為道德評估詞彙，人們藉著道德優勢或者選擇另一種西方理論否定他人作品中的某些觀點。此種論述模式讓中國知識份子分化為兩個對立陣營：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事實上長江《讀書》獎的論爭就是依循著兩造劃定之範圍進行討論。而這樣的命名有時是為了貶低學術界的對立陣營；有時則是為了彰顯自身之立場。也就是說，當中國知識份子使用西方理論知識時，通常用於確認或否定他人的某些論述，「新自由主義」或「新左派」不單是特定的理論立場，在中國的語境中，它們同時被賦予道德評價的作用。相較於以英文撰寫探討理論之論文，中國知識份子以中文撰寫之著述蘊含更多的言外之意，英文讀者難以解讀這些隱喻，從而中國知識界的論爭自（英語語系）外部的觀察者與（華語語系）內部的參與者間產生相異之詮釋。⁴⁵透過上述的觀察與分析，白杰明確立了華語語系（Sinophone）具有獨特的脈絡及意義體系，且能夠當作中國研究的新對象。

2005年，白杰明首次提出後漢學作為研究取徑，同時將華語

44. 長江《讀書》獎由北京三聯書店《讀書》雜誌與香港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共同舉辦，特邀費孝通為名譽主席，負責評選學術委員會成員，汪暉則為該委員會之召集人。2000年6月，《南方周末》於公佈此獎項首屆的評選結果時，同時指出不論部分得獎者（費孝通、汪暉與錢理群）的學術成就，其身分並不適宜獲頒此獎項。以此為開端，長江《讀書》獎的爭議在中國學術、文化界引起廣泛之討論，成為特定的議題與事件。

45. Geremie R. Barmé and Gloria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 Intellectual contestation and the Chinese web," in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pp. 89~90.

語系世界視為主要研究對象。

許多澳洲的中國學學者在青年或者至少20多歲的年紀時，就已經實際參與華語語系世界。我們參與中國的重要經驗，違反了僅將中國當作專業學術研究對象的觀看原則。與此相反，我們參與的是一種語言及文化，並因此改變我們英語語系（Anglophone）慣習的思維方式：一個於內在糾纏著我們的他者...。⁴⁶

於〈New Sinology〉一文，華語語系世界不僅涵蓋所有使用華語的社群，亦被當作一種文化體系。雖然白杰明⁴⁷使用華語語系取代中國、中華民族或中文等名稱，但其含括之範圍仍集中於標準漢語和書面漢語（從傳統文言文至現代白話文體），並未如文學研究強調華語語系蘊含之在地化、混雜性與多樣性。他側重彰顯華語語系作為不同於英語語系之文化、思維方式，提出一種有別於當代中國研究結合社會科學，採取客觀中立原則的研究方法；一種傾向人類學、強調參與觀察和田野調查之研究取徑。相較於2005年主要提出華語語系世界作為跨國界的中國圖像，2008年白杰明於〈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進一步指出，「華語語系」世界是「一個由使用各種源自中國語言與方言的個人與社群組成」。這表明，他將其視作由諸多不同於漢族之民族與文化所構成的社群，強調其作為一個開放社群與人們使之存在的實踐。

使用中文、與中國人共同工作以及想像中國等行動，為生活在中國及與之相關連的人們，傳承與增加各種中國傳統。⁴⁸

換言之，從海外的離散狀態至內部民族的多樣性，白杰明指

46. Geremie R. Barmé, "New Sinology." <http://ciw.anu.edu.au/new_sinology/index.php>

47. Geremie R. Barmé,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48. Geremie R. Barmé,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稱為華語語系世界的範圍已經與華語語系文學重合，透過解散民族國家的邊界顯露隱藏在其背後的中國圖像。

而白杰明與史書美各自由不同之出發點獲得此中國圖像，後者自民族認同與後殖民的隱喻展開論述，華語語系對「中國」民族、語言混雜事實的還原，強化了行動者的自主性；白杰明則是提議以華語語系世界替代自西方為中心展開的中國知識。澳洲的中國研究因歷史沿革深受美國當代中國研究之影響，在二戰和冷戰背景下衍生了認識敵人的需求，促使區域研究以迅速掌握非西方世界現況的知識活動出現。Tessa Morris-Suzuki認為⁴⁹，1952年澳洲國立大學設立太平洋研究所是源於戰後政治、經濟與戰略的需要。在（亞洲）區域研究框架下進行的中國研究，從而形塑了澳洲國立大學中國研究的「東方學」傳統。由此可推論「東方學」之於澳洲的中國研究除代表研究東方經典著作、歷史及語言的學術典範外，更象徵以西方為中心向外延伸的空間框架。雖然歐洲與北美的區域研究者促進了戰後西方世界對亞洲、非洲與其他社會的理解，但西方中心的立場卻造成該研究取徑理解非西方世界的限制。

相對於理解其他區域、文明或文化的現代性經驗，區域研究更提倡將其他區域、文明當作對比類型，以比較分析的方法理解現代化進程，即現代性多大程度再現了西方文明模式的勝利？其他文明模式能適應現代秩序至何種程度？哪個地區擁有的文明模式與傳統最有助於其經濟與社會之發展？在此問題意識與認識興趣下，區域研究實際上再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當西方社會已經發展到現代經濟、政治階段時，其他區域、文明仍停留在西方社會發展的初期；仍需要適應、改革才能有所進展。同時，為了提供對社會現象更普遍的理解，區域研究忽略區域內各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差異，

49. 參見Tessa Moris-Suzuki, "Anti-Area Studies," *Communal/Plural*, Vol. 8, Issue 1 (July 2000), pp. 9~23.

以掌握跨越民族與國家的深層文化結構。而此種空間框架的建立，取決於研究者合併他們假定本質上相似的社會空間，故澳洲與英、美國家等英語世界地理位置上的距離能夠被克服，且將澳洲視為解讀亞洲的橋樑。⁵⁰

當白杰明提議以華語語系世界取代既有的空間及血緣之共同體想像時，一方面是因研究中國之動機隨國際情勢而變化，冷戰結束後國家安全與戰略需求不再是區域或中國研究的主要目的，中國如今對澳洲代表著其他的意義。1980年代澳洲政府施行「參與亞洲」政策，以及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改變了中國之於亞太區域（包含澳洲）的象徵。因而，基於上述現實與中澳關係的轉變，澳洲無法繼續置身於遠東（亞洲區域）之外，需要描繪新的中國與世界圖像。在此情況下，白杰明藉華語為共通性，整合澳洲中國研究的兩種取向：以國家領土為界對漢族與其他族群體的研究以及關注漢族移民及其後裔的海外華人研究。

前者顯示以「漢」族為主的研究簡化了中國的語言、民族與文化，白杰明⁵¹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內的語言、人民、文化與傳統皆有其獨立的歷史，而「異族政權創造的歷史在今日被視為中國，主要是漢族中國的歷史」。⁵²他認為這種張冠李戴的現象是由於中國研究長期把中國內部視作僵硬且同質化的假定，不僅忽視了今日中國大陸的疆界是於近代持續擴張與兼併下所形成的；同時助長了以漢族為主對少數民族等中國「內部他者」的壓迫。進一步而言，華語語系世界除突顯以地緣親近性構成之中國內部民族、文化

50. Tessa Moris-Suzuki, "Anti-Area Studies," p. 20.

51. 參見Geremie R. Barmé,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52. 為了避免將中國文化、歷史等同漢族文化與歷史，白杰明的中國遺產研究或歷史敘事皆使用漢族中國、滿族等名稱區隔他所指稱的對象或歷史朝代。

的多樣性外，亦包含著對所謂西方文化的批判。他指出，英語世界同樣為非盎格魯·薩克遜的使用者所轉化與充實，從而現代化進程視為典範的西方文明、文化模式可能也是由諸多區域和民族經過歷史長期融合所致，而非與其對比類型（非西方文化）存在著根本地對立及差異。

雖然史書美與白杰明皆主張華語語系世界作為開放的群體，但兩者側重之方向卻有所不同，前者對開放的定義在於行動者可以因不再使用華語脫離群體，從而使用華語成為一種選擇與實踐，需要透由在地脈絡、個人背景等方能賦予此行動意義；白杰明則是強調行動者能夠透過使用華語而參與該社群，傳承與增加各種中國傳統。就此而言，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概念是期望實現華語語系文學和華人的在地化；白杰明則期望透過分離語言與國籍、族裔間的連結，使原先因地緣或血緣被排除在外的個人與群體能夠被納入，建構包含各種立場、文化與時間之中國文化社群。

伍、結論

當白杰明將華語語系世界定義為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由中國社會與文化交織形成時，亦指出限制創造此種新意涵的觀點：強迫中國適應民族國家的概念與以歐美經驗為典範的社會發展單向聚集之假設。⁵³基於中國將與我們（西方社會）越來越相似的前提下，使學界忽視一種「在維持學術價值與規範下，試圖從內部理解而參與中國事物的中國學」。換言之，白杰明的看法相當程度是源於對西方中心觀點之辯駁所形成，而《東方主義》出版後薩伊德的論述就成為批判這種立場的主要觀點。東方主義的批判從研究

53. Geremie R. Barmé, “New Sinology 后汉学/後漢學,” *The China Story*, (2013).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new-sinology/>>

者受到既有文化、制度與政治環境制約的角度展開，知者作為切蛋糕又是先挑選的人造成了其與被知者間權力的不對等。藉著連結權力與知識，現代化模式把西方描繪為進步的現代社會；中國則相對為停滯不前的傳統社會。⁵⁴於是，傳統中國在與現代西方的接觸下，從原本沉睡不醒、落後不變的狀態中獲得解放；從外界強加之僵硬、缺乏變化的狀態中獲得解放。

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使西方現代社會發展的路徑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西方現代文明似乎具有從某一社會層面（如市場經濟）擴散至其他社會層面（如自由民主思想）之作用。然而，白杰明認為這些預測中國將與我們（西方）越來越相似的觀點，實際上皆忽略中國社會秩序與文化的獨特性，新的經濟秩序必須建立於既有的共產主義體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上。而他對中國社會脈絡特殊性的強調，是傳承了中文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內人類學之傳統。對於許多澳洲的中國研究者來說，中國似乎並非僅意味著一個政治單元的組合，反而更像一個多民族與地方構成的對象。在關於後漢學的文章中，白杰明進一步以華語語系世界詮釋多民族與地方組成「中國」之概念。藉著對區域與當代中國研究的批判，多民族與地方的概念獲得擴充，「中國」不再僅是地緣上親近空間的集合或附屬漢族歷史的其他民族，而是跨越國家邊界與民族的開放社群。以華語重劃的中國圖像改變了華人的分布以及澳洲所屬之位置，使澳洲不僅是在政策、利益認知上脫離歐美國家，更在認識上脫離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圖像。

54. 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2年），頁176~177。

參考文獻

一、中文

Gloria Davies著，吳冠軍譯，「中國知識界：共同體追求中的分歧」，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分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99~281。

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02年）。

Václav Havel著，崔衛平等譯，**無權力者的權力**（台北：左岸文化，2003年）。

王德威，「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華文作家在哈佛大學」，**聯合報**，2006年7月8~9日，第E7版。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作為文化生產的場域」，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編，**百川匯海：文史譯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15。

-----，「華語語系的概念」，**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馬來西亞），第14期（2011年），頁41~55。

涂成林，「穿針眼的樂趣—青年漢學家白杰明印象」，**開放時代**（廣州），第10期（1999年），頁114~117。

張錯，「文學獎的爭議與執行—世界華文文學領域探討與展望」，**文訊**（台北），第222期（2004年4月），頁4~7。

曾彥中，「澳洲中國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與何包綱的學思歷程為例」，**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二、英文

Barmé, R. Geremie, "History for the Masses,"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 *Shades of Mao: 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0).
- , *An Artistic Exile: A Life of Feng Zikai (1898-197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 "New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Newsletter Issue*, No. 31 (May 2005).
- <http://ciw.anu.edu.au/new_sinology/index.php>
- , "Worrying China & New Sinology," *China Heritage Quarterly*, No. 14 (June 2008).
-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articles.php?searchterm=014_worryingChina.inc&issue=014>
- , "New Sinology 后汉学/後漢學," *The China Story*, (2013).
-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new-sinology/>>
- Barmé, R. Geremie and Gloria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 Intellectual contestation and the Chinese web," in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e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 Brzezinski, Zbigniew,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 Havel, Václav,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Jan Vladislav ed.,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 Holmes, Leslie, *Post-Commun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Suzuki, Tessa Moris, "Anti-Area Studies," *Communal/Plural*, Vol. 8, No. 1 (April 2000), pp. 9~23.
- FitzGerald, Stephen, "A Chinese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The China Story*, (2012).
- <<https://www.thechinastory.org/2012/12/a-chinese-stretch-of-the-imagination-%E8%88%92%E5%B1%95%E7%9A%84%E6%83%B3%E8%B1%A1%E5%8A%9B-%E6%BE%B3%E5%A4%A7%E5%88%A9%E4%BA%9A%E4%B8%8E%E4%B8%AD%E5%9B%BD%E5%B7%B2%E5%B1%8A%E5%9B%9B%E5%8D%81/>>

聯絡作者：石之瑜

聯絡地址：10617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電子信箱：cyshih@ntu.edu.tw

收稿日期：2016/08/07

審稿通過：2016/10/18

責任編輯：方恩斌、詹為元